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成果

清代琉球官话 课本语法研究

QINGDAI LIUQIU GUANHUA KEBEN YUFA YANJIU

李 炜 等著



A Grammatical Study of
the Ryukyu Mandarin Textbooks
in Qing Dynas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海外珍藏汉语文献与南方明清汉语研究”成果

清代琉球官话 课本语法研究

QINGDAI LIUQIU GUANHUA KEBEN YUFA YANJIU

李 炜 石佩璇 刘亚男 黄燕旋 著



A Grammatical Study of
the Ryukyu Mandarin Textbook
in Qing Dynas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琉球官话课本语法研究/李炜等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6
ISBN 978-7-301-25917-7

I. ①清… II. ①李…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1391 号

书 名	清代琉球官话课本语法研究
著作责任者	李 炜 石佩璇 刘亚男 黄燕旋 著
责任编辑	唐娟华 王 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917-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1.5 印张 370 千字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序

唐钰明

本书是以李炜为代表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结晶。除李炜之外,本书的作者石佩璇、刘亚男、黄燕旋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就预示着该方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强劲的未来。

本书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语料全新。以琉球官话系列课本为核心,兼及同时期的北京官话文献、西南官话文献,还有南方方言、西北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田野考察,以此揭开了“新材料带来新学问”的新篇章。

二、方法独到。对近代文献的追踪以及现代语言的考察,实现了纵向的历时演变和横向的共时比较、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研究的结合,同时也具有语言类型、语言接触的新视角。

三、观点崭新。指出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分界点为18世纪中叶,从而将现代汉语的起点大为推前。它还揭示了汉语官话所具有的南北差异——“南方官话”,显然是与“北方官话”相对的一种客观存在。

鉴于本书语料、方法、观点的重要创新,在海内外学术界也得到了很高的认可,我谨在此予以特别隆重的推荐。

2015年5月18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琉球官话课本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内容概况	1
第二节 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现状	2
第三节 琉球官话课本的年代考证	4
第四节 琉球官话课本的语言学价值	23
第五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和用书版本	26
第六节 简称与凡例	29
第二章 琉球官话课本中的给予句	31
第一节 琉球官话课本中的给予句	32
第二节 北京官话文献《红楼梦》中含 “给”的给予句的使用情况	35
第三节 从琉球官话课本和《红楼梦》的给予句 看句子给予义的表达	37
第三章 从琉球官话课本的非双宾给予句 看 S_2 、 S_3 的地域分布	41
第一节 琉球官话课本及同时期北京官话 文献中 S_2 、 S_3 的使用情况	42
第二节 清中叶以来历时文献中 S_2 、 S_3 的使用情况	46
第三节 S_2 、 S_3 在当今汉语方言及共同语中的分布情况	53
第四节 从 S_2 、 S_3 的性质差异 看琉球官话课本的南方属性	57
第四章 琉球官话课本中的与事介词	60
第一节 琉球官话课本中的与事介词	60
第二节 清中叶以来历时文献中与事介词的选择差异	67

第三节	当今汉语方言与事介词的选择差异	79
第四节	从与事介词的使用再看琉球官话的南方属性	86
第五章	琉球官话课本中的复杂给予句	88
第一节	琉球官话课本中的复杂给予句	88
第二节	从琉球官话看复杂给予句的性质	92
第三节	复杂给予句中“使役感”的由来	99
第六章	琉球官话课本中的使役句和被动句	105
第一节	琉球官话课本中的使役句和被动句	105
第二节	清中叶以来历时文献中的使役句和被动句	114
第三节	当今汉语方言使役范畴与 被动范畴的类型差异	120
第四节	使役范畴与被动范畴的关系探讨	125
第五节	从使役句和被动句看南方官话 对北京话的影响	129
第七章	从琉球官话课本中的“给”看汉语语法类型差异	135
第一节	汉语官话/方言语法的类型差异	135
第二节	汉语语法类型与语言接触	138
参考文献		143
附录一	汉语给予句式使用情况调查问卷	148
附录二	汉语方言语法调查项目	152
附录三	琉球官话课本照片	155
附录四	琉球官话课本文献	159
索引		335
后记		338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琉球官话课本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内容概况

汉语曾经是亚洲多个国家文人学士的共通语。这些国家保留了大量汉语文献,这些文献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汉语的面貌,对汉语史的研究弥足珍贵,具有中国传世文献所无法替代的研究价值。本书的研究对象——琉球官话课本就是珍贵海外汉语文献中的一种。

琉球国即今日本冲绳县,15 世纪之前为中山、山南、山北三国,1429 年中山统一了其他两国,建立琉球王国。明清时期,琉球国是中国的藩属国,接受中国的册封,并向中国朝贡,双方保持这种关系达五百年之久。在这期间,琉球人民为了与中国交往,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汉语学习在琉球国显得十分重要。据史料记载,琉球国曾向中国派遣官生(相当于今天的公费留学生)学习汉语和汉文化,民间也有勤学人(相当于今天的自费留学生)前往中国学习。为了满足琉球国官生和勤学人的学习需求,一批汉语学话课本应运而生,琉球官话课本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至今保留较完整的琉球官话课本有《官话问答便语》《百姓官话》《学官话》《广应官话》及《人中画》。以下分别简称为《官》《白》《学》《广》和琉本《人》。

《官》《白》和《学》三种材料是学话课本,均为问答的形式。《官》和《学》是情景会话课本,主要内容是琉球国的进贡官员、官生、勤学人等与中国福州官员、教书先生、商人、医生等的会话记录。《白》则是一本故事性会话课本,讲述的是山东登州府商人白瑞临雇瞿张顺等人掌船去江南卖豆子,途中遭遇台风,幸遇琉球地方官员和通事(即翻译)的救助,一年后返回福州的故事,主要是中

国难民与琉球官员(主要是通事)的会话记录。作为阅读课本的琉本《人》是一部拟话本小说,包括五个故事——《风流配》《自作孽》《狭路逢》《终有报》《寒彻骨》。《广》是一部分类语汇集,所收语汇分列于“天文、时令、地理、宫室”等三十个门类中。它以词和短语为主体,也有一些话语片段分散于各门类中,但不是问答形式,说话人的身份尚难判定。

这几种琉球官话课本文献均发现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天理大学图书馆、关西大学总合图书馆长泽文库等多个图书馆均有藏本。在不同馆所藏的诸多版本中,较为完善的是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手抄本(李丹丹 2013)。本书以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琉球官话课本为研究对象,下文提到的琉球官话课本也指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版本。这五种语料中,《官》15,775 字,《白》17,036 字,《学》13,641 字,《广》35,387 字,琉本《人》100,564 字。《广》的研究价值主要在词汇上,《官》《白》《学》和琉本《人》有连贯对话或叙述文章等成段语料,在历时语法研究上有其他传世文献无法替代的价值。

第二节 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现状

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始于日本学者。日本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介绍琉球官话课本的内容和琉球的中国语教学史。佐藤晴彦是首位从语言角度研究琉球官话课本的学者,他在 1978 年的文章中列举和概述琉球官话课本的数十种语言特点,但因为文章篇幅所限,缺乏较为深入的专项研究。此后,濑户口律子和佐藤晴彦合作,对天理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五种琉球官话课本进行整理、翻译,并对琉球官话课本进行语音、词汇方面的研究,从语音的角度对琉球官话课本的语言属性进行了初步探索。木津祐子是近年来日本学界对琉球官话课本着力最多的研究者,她将日本法政大学的琉球官话课本新资料应用于研究,取得较为突出的成绩。日本学者对琉球官话课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对琉球官话课本的介绍,如《百姓官话全訳》(濑户口律子 1994a),《琉球官话课本研究》(濑

户口律子 1994b),《日本琉球的中国语课本〈广应官话〉》(濑户口律子 1996),《学官话全記》(濑户口律子 2003),《漢語資料による琉球語研究と琉球資料による官話研究について》(石崎博志 2001),《清代乾隆年间琉球久米村通事的学门和官话》(木津祐子 2007); 2) 不同藏书版本的比较、校对,如《『百姓官话』两种における比较》(濑户口律子 1992),《赤木文库藏『官话问答便语』校》(木津祐子 2004a); 3) 语音方面的研究,如《琉球官话集の反切について》(矢放昭文 1982),《『新刻官話匯解釋義音注』から『新刻官話匯解便覽』へ》(木津祐子 2001); 4) 词汇、语法方面的研究,如《琉球官话课本『广应官话』の言語》(濑户口律子 1994c),《琉球官话课本の言語——课本の中の福州话》(濑户口律子 1994d),《琉球〈官话问答便语〉及其语言的考察》(濑户口律子 2008),《琉球编纂の唐话课本に見る『未曾』『不曾』『沒有』——その課本間差異が意味すること》(木津祐子 2004b),《清代福建的官话——以琉球官话课本的语法特点为例》(木津祐子 2004c)等。其中,濑户口律子(1994b)的《琉球官话课本研究》一书,首先介绍了琉球国和中国的关系,其次介绍琉球官话课本的基本情况,然后分章谈《官》《学》《白》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现象,后附三种琉球官话课本的语料,为中国学者研究琉球官话课本提供了方便,是中国琉球官话课本研究的基础。

在中国,琉球官话课本的主要研究者是本书第一作者李炜及其学生。2003年李炜赴日任教一年,获得《官》、《学》、《白》、《广》、琉本《人》等语料并将其带回国内,开始对琉球官话课本进行语法研究。从2003年起,李炜率领的研究团队先后在《中国语文》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琉球官话课本编写年代考证》(《中国语文》2004)、《琉球官话课本中表使役、被动义的“给”》(《中国语文》2007)、《琉球写本〈人中画〉的与事介词及其相关问题——兼论南北与事介词的类型差异》(《中国语文》2011)、《琉球官话课本的使役标记“叫”、“给”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语文》2013)(前两篇为李炜与濑户口律子合作,后两篇为李炜与王琳合作),以及《从版本、语言特点考察〈人中画〉琉球写本的来源和改写年代》(《中山大学学报》2007)(李炜与李丹丹合作)等,引起国内外学者对琉球官话课本研究价值的重视,成为国内琉球官话语法的主要

研究者。同时,李炜指导博士生、研究生以琉球官话课本为主要研究对象,撰写出2篇博士论文及若干篇硕士论文,对琉球官话语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李丹丹的博士论文《清琉球官话课本〈人中画〉语法研究》(2008)以琉本《人》为主体语料,从版本学的角度,充实了琉本《人》的断代研究,用更多的语法项目确定了琉本《人》的编写年代为18世纪中叶,并将琉球官话课本与同时代的“北方官话”作品、南方方言作品等进行比较,发现琉本《人》与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存在一系列差异,而与粤、客、闽、吴等南方方言存在整体的语法对应。王琳的博士论文《琉球官话课本中的“得”、“替”、“给”及相关问题研究》(2011)在发现琉球官话课本“替”“给”具有南方地域特征的基础上,又发现了琉球官话课本中多功能词“得”的南方地域属性,并引申出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视角,将琉球官话课本的语法研究引向更深入而广阔的领域。

其他的研究如陈泽平(2004)讨论了琉球官话课本的语音属性,还有一些研究散见于对清代官话音、清代对外汉语教学史的介绍中。

第三节 琉球官话课本的年代考证

在琉球官话课本的编写年代确定之前,学者们已经在词汇和语音等方面对琉球官话课本做了一些开创性研究,但始终未能引起汉语学界足够的重视,最大的原因就是琉球官话课本所代表的语言时期不能确定,无法对它们在汉语史上的地位进行判定。李炜等采用历史学的考证方法,结合历时语法研究,考证出琉球官话课本《官》《白》《学》的编写年代(濑户口律子、李炜,2004);用版本学及语言学的方法,考证出琉本《人》的改编年代(李炜、李丹丹,2007),论证方法及结论如下:

对《官》《白》《学》编写年代的考证,依据的史料主要有:1)《历代宝案》(全十五册,“国立”台湾大学印行,1972,以下简称《宝案》),2)《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94,以下简称《续编》),3)《清代中琉关系档案三编》(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1996,以下简称《三编》),4)《清代琉球国王表奏文书选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黄山书社,1997,以下简称《表奏》),5)《中山传信录》(康熙六十年二友斋刻本,以下简称《传信》),6)《琉球国志略》(乾隆二十四年漱润堂刻本,以下简称《志略》),7)《琉球入学见闻录》(乾隆二十九年刻本,以下简称《见闻》),8)《续琉球国志略》(光绪八年刻本,以下简称《续琉》),一共八种史料。后四种史料均收入《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全三册,黄润华、薛英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以下简称《汇编》)。前四种史料均为历史文档汇集,价值很高。而其中内容最为丰富、历史脉络最为清晰的当数《宝案》,它是琉球国中山王朝与中国往来的文书集成,汇集了自明永乐二十二年至清同治六年(1424—1867年)四百多年间琉球方面的“表奏”“国王咨”“符文”以及中国方面的“诏勅”“礼部咨文”“福建布政史司等咨”等历史文档。

《官》《白》《学》都提到同样一件事:琉球国每两年向中国皇帝进贡一次,贡物为“硫磺、红铜、白刚锡”。据史料记载,琉球国中山王朝向中国皇帝进贡始于明洪武元年(1372年),该年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来中国向明太祖“贡方物”,品种达二十余种(《传信》,《汇编》中册202页),到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成为日本国冲绳县以后进贡才结束。琉球向中国的进贡分两种:一种是“常贡”,又叫“正贡”“例贡”。“常贡”是定期的,其品种由中国皇帝钦定(尤其是清代)。另一种是以“请封、谢恩、庆贺”等为由不定期向中国皇帝进奉各种礼物,其品种由琉球国中山王自定。因而,我们可以通过史料中“硫磺、红铜、白刚锡”最初作为常贡的时间,确定《官》《白》《学》的时代上限。

据《传信》、《宝案》(一、二册)等史料记载,从明洪武年到清康熙十九年,琉球的常贡物中最主要的是马和硫磺,到了康熙二十年才停止贡马。康熙二十年,“谕琉球国贡方物以后止令贡硫磺、海螺壳、红铜,其余不必进贡”,康熙皇帝还钦定了各贡物的数额:“熟硫磺一万二千六百斤,海螺壳三千个,红铜三千斤”,与此同时“于常贡内免其贡马”(《传信》,《汇编》中册293—294页)。《宝案》(738页)、《见闻》(《汇编》下册318页)中都有同样记载。康熙二十三年,

康熙又令琉球“免贡海螺壳”，“是后定常贡熟硫磺一万二千六百斤，红铜三千斤，白刚锡一千斤”（《见闻》，《汇编》下册 319 页）。康熙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福建布政使司给琉球国的咨文中也说：“旨除海螺壳免进外，仍照旧例处贡熟硫磺一万二千六百斤，红铜三千斤，另改炼熟白刚锡一千斤”（《宝案》377 页）。查各相关史料，证明康熙二十三年以后，琉球国向中国皇帝进贡的常贡均为“熟硫磺一万二千六百斤，红铜三千斤，白刚锡一千斤”，两年一贡，没有间断。据此，我们可以断定，《官》《白》《学》编写的上限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

一、《白姓官话》的编写时间

《白》通篇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一只苏州府常熟县的商船于“旧年十二月十八日”（引号内为《白》书中原字句，下同）从山东“胶州”开出，半洋遭遇风暴，“十二月十九日”漂至琉球国“大岛地方”，地方官给予救助并修理破损的船。船修理完毕，地方官又送给他们足够的食品及日用品，该船又于“今年二月二十日”从“大岛地方”开出，不料又遇大风无法回国，于“二月二十一日收到奇界岛”。该船难民于“四月”被地方官安置在名叫“泊村”的地方。这些中国难民受到了地方官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该船的一名水手名叫“朱三官”，于“旧年”得了“吐血的病症”，地方官派医生为他悉心治疗并给他服用了“人参”，但终因医治无效，朱三官于次年“七月初七日酉时身亡”。该船船主名叫瞿张顺，雇船的“客人”名叫“白瑞临”。瞿张顺两次被问及“贵姓”时均答曰“姓张”，但在正式呈递给地方官请求安葬朱三官以及临回国前谢恩的“呈子”中均自称“难人瞿张顺”。《白》中还简略提及了另一只中国商船，这是一只福建商船，也于“旧年”遭风漂至琉球，船上有“二十七名”中国人，也被地方官救助并安置在“泊村”，与瞿张顺等做了邻居。这二十七人中有一姓“潘”的。由于两船已废弃，又都没有赶上琉球派往中国的“接贡船”，这些中国难民只好搭乘次年的“贡船”，由琉球贡使护送他们回国。《白》中没有提及苏州商船上的人数和福建商船船主的姓名。

现在我们来看看相关的史料记载（以下黑体为笔者所加）。乾

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琉球国中山王给中国福建布政史司的咨文中是这样说的：“乾隆十五年四月初七日据大岛地方官报称，旧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海船一只飘到本地。其船户瞿张顺等口称，张顺等一十三名系江南苏州府商人，本年十一月初七日山东开船……行到洋中陡遭飓风，十二日到胶州，十八日胶州开船[][]（按“[]”为原文缺字或字迹不清之处，下同）洋中忽遇暴风，失舵断桅，二十九日飘到大岛地方，即蒙地方官修理船只，发给米盐菜烟等项。十五年二月十九日彼地开船，詎料洋中又逢大风，二十一日[]到奇界地方……彼地方官给予廩饩收养，随将所飘难民瞿张顺等一十三名并捞[]物件四月初四日送到山北运天地方，彼地方官转送既至中山泊村地方……难民水梢朱三官[]十二月间在奇界地方身染吐血病症……医生尽心，用人参等种。奈病根已深，十二月初八日酉时身故……乾隆十五年五月初七日据麻姑山地方官报称，旧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船一只飘到本地。其船户蒋长兴等口称，长兴等二十七名系福建福州府闽县商人……将所飘难民蒋长兴等二十七名并[][]物件送到中山泊村地方，发馆安插，给予廩饩收养……兹逢进贡之使，附搭二号贡船，都通事郑馀庆等解送……”。该文末尾开列了两船的人员名单，其中苏州商船人员中有“常熟县船户瞿张顺……客人白瑞临”，福建商船人员中有“客商潘顺观”（详见《宝案》2622—2624页）。乾隆十六年九月“礼部为奉谕优奖护送内地遭风商民之琉球贡船事致内阁典籍厅移会附上谕一”专门就琉球国“将闽县遭风船户蒋长兴等、常熟县船户瞿长顺等（按“长”应为笔误）留养二年，给予口粮，随船护送来闽”之事特别嘉奖了国王尚敬及“其在船之官伴水梢人等”（《三编》51页）。

比较《白》中所述与史料所述，二者除个别的时间细节略有出入以外，绝大部分细节完全吻合。看来《白》所述事件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并非虚构。另外，在中琉关系史上也并非只发生过这一次琉球国救助中国难船的事件。此类事件相当多（尤其在康熙二十三年以后），平均三四年就有一次，记载得同样详尽甚至更为详尽，在《宝案》《续编》《三编》等史料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所以，也不存在因《白》中所述事件非常著名所以后人据此编书的可能性。

根据史料的印证，我们可以断定，《白》的编写时间应在乾隆十五

年(1750年)。

二、《学官话》的编写时间

《学》中有这样一段问答：“问：你们琉球船到这边来，是做什么的？答：我们是来接王舅的。问：你王舅是几时来的？来这边有什么事干呢？答：我们王舅是旧年来的，是国王差他来庆贺皇上的……问：你们来进贡是什么东西呢？答：我们敝国地方小，没有出什么好物件，只是硫磺、红铜、白刚[]，带来进贡就是了。”这段问答包含了三个信息：一是琉球国王派王舅来“庆贺皇上”。这里的“庆贺”应指庆贺皇上登基。查所有琉球国给中国的文书，“庆贺”二字均专指庆贺中国皇帝登基。二是此次琉球国王派王舅来庆贺皇上登基并进贡三样常贡，两件事情同时进行。三是对话人中的答者是“接贡船”上的官员。琉球国派往中国福建的进贡船开出后的第二年，接贡船便开出。接贡船的使命是恭迎皇上的赏赐并迎接从北京返回福建的贡使们，而后与贡使们一同回国。进贡船两艘，接贡船一艘。

康熙二十三年以后，琉球国两年一次的常贡一般由耳目官、正议大夫、都通事等“率领官伴水梢共不过两百员名，坐驾海船两只，分载常贡”三样（“国王咨”中的套语）来中国。王舅来中国是不定期的，往往是因请封、谢恩（比如册封国王之后）尤其是庆贺等由才来中国的，进奉给皇上的礼物一般为十几二十样“土产”（从略），与常贡的品种、数量不同。据史料记载，雍正元年琉球王舅翁国柱、乾隆二年王舅向启猷、道光二年王舅向廷谋、同治二年王舅马文英诸位王舅均来中国进奉十几二十样“土产”庆贺皇上登基，没有同时进贡常贡。光绪登基时琉球王舅没有来。只有嘉庆元年、咸丰元年是王舅来“进贡兼庆贺”的。嘉庆元年琉球国中山王尚温遣王舅东邦鼎等“坐驾海船两只，分载常贡……并恭进太上皇帝御前庆贺礼物……恭进皇帝御前庆贺礼物……进奉皇后殿下庆贺礼物……”（详见《宝案》4153—4154页）。咸丰元年琉球国王尚泰遣王舅夏超群等“坐驾海船两只，分载常贡……并进皇帝陛下庆贺礼物……进奉皇后殿下庆贺礼物……”（详见《宝案》7830页）。《三编》中也清楚地记载了这两次王舅来进贡兼庆贺的事（详见《三编》

287 页、607 页)。

据此,我们暂将《学》的编写时间锁定在两个时间里,即嘉庆二年或咸丰二年。

《学》中还有这样一段问答:“近来耳闻得你们那边要过来请封,却有这个事没有呢?”“这个事还未定,现今国王孝服尚未满,想必未便举行。大约到服满了,才敢过来请封么?”琉球国王要向中国皇帝请封,册封为王以后才是中国正式承认的琉球国王。咸丰年间琉球国王尚泰没有向中国皇帝请封。尚泰于道光二十七年自立为王,他的父亲“琉球国王尚育于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病故”(《续编》1372 页)。从守孝需三年计,嘉庆元年年底就是尚泰服满之时,完全可以请封了。换句话说,如果是咸丰二年,尚泰已经不存在“孝服尚未满”的问题。但他直到同治五年才请封(见《续琉》,《汇编》下册 181 页;《续编》1470 页)。这与《学》中所述不符。我们再来看看嘉庆年间的琉球国王尚温,尚温于乾隆五十九年自立为王,嘉庆三年八月十九日他在给中国礼部请求封王的咨文中说:“臣祖尚穆于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初八日薨逝,臣父哲为世子时早已辞世。念臣小子温以嫡孙承祧,恭循典例,虔请封袭。”(《宝案》4273—4274 页)嘉庆三年八月十九日“琉球国中山王世孙尚温为恳请循例封袭事奏文”(《表奏》563 页)、嘉庆四年六月初十日“礼部为琉球国遣使进贡兼请袭封事致内务府咨文”(《三编》299 页)均有详细记载(从略)。尚温的祖父尚穆于乾隆二十一年被册封为王,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八日去世。尚温的父亲尚哲则于乾隆五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去世。尚温于嘉庆三年八月十九日派耳目官向国垣等来中国请封(《三编》299 页、《表奏》563 页)。从乾隆五十九年四月八日到嘉庆三年八月十九日是三年又四个月的时间,也就是说嘉庆三年四月以后才是尚温“服满”之时,所以嘉庆二年对尚温来说确实是“孝服尚未满”。

根据以上史料看,琉球国于嘉庆元年派王舅东邦鼎等来中国庆贺兼进贡,于嘉庆三年派耳目官向国垣等来中国进贡兼请封。那么,《学》中对话的时间正是在嘉庆二年。据此,我们判定《学》的编写时间应该在嘉庆二年(1797)。

三、《广应官话》的编写时间

《广》中的话语片断不多且不集中,但其中至少有七处与《学》的内容相同、相当或相似。以下《学》例为A组,《广》例为B组,我们举其中四组例子比较如下:

A1:“今日雾气大得狠,这个雾下得好厚哩!你看那山都慢住了,一些也看不见的。人说障气,这就是山岚障气。人若冲着他,就要得病的。”“这样说,我们早晨不要出去,等雾开了出去罢。”

B1:“这个雾好大哩!你看那山都慢住了,一点也看不见。人说障气,这就是山岚障气。人若冲着他,就会得病。”“这样说,我们早起不要出门,等雾开了出去罢。”

比较A1,B1除了比A1少几个字并改动了几个字以外,其余完全一致。

A2:“不知道你们那边这三月三也有人去郊外踏青没有?”“有的,我们那里这一日也有到水边去玩的,也有到青草坡地方铺毡吃酒的,也有带着婊子去弹唱的,来来往往,好不闹热的。”

B2:“我们那边到三月三也有到水边去玩的,也有到青草处铺毡吃酒。那百姓的人,也有这样的。也有带着婊子去弹唱的。”

A2是问答形式,句义连贯;B2变成了一人说到底,而且句义不够连贯。

A3:“今日九月九,是重阳节。人人都携酒登高插茱萸,学那孟嘉落帽的故事。我们客边寂寂在这里,好不冷淡了人么?”“这个何难。我们也收拾些酒肴,不必上山去,只在天后宫楼上庆赏重阳,也是登高一样的,何必一定要到那山上去呢?”“你讲的更妙,我们将酒排在楼上吃,看那山上登高的人往往来来,更觉有趣。”

B3:“九月初九重阳节,人人都携酒登高插茱萸,学孟嘉落

帽故事。而今我们收拾酒肴,也不必上山去,就在天后宫楼上庆赏重阳,也是登高一样。望那山上登高的人往来往去,也是好光景。”

A3 是问答形式,B3 不是。而且,B3 明显是 A3 的“压缩版”。

A4:“这个人是生杨梅疮么?”“这个人原生棉花疮,如今变做疯毒了。”“好怕人,一身希臭的。他当日才生的时节为什么不请医生调治,给他烂到这个样呢?”“他原先才生的时候就请人来医治。那医生也不知换了好几个,银钱用去多少,总医不得好,如今年代久了,越发不得好了。”“这样说,这个人可怜得紧。”

B4:“这个人生杨梅疮。那个人坏得很。这个人可怜的紧。那个人可爱得紧。这个人原生杨梅疮,如今变做疯毒了。”

A4 是问答形式,B4 不是。A4 是一个完整的句群,B4 则是彼此毫不相干的五个句子,只是其中有三个句子与 A4 的完全一致。

比较以上四组的 A 例和 B 例,我们不难看出 B 例是在 A 例的基础上紧缩、改造而成的。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广》的编写年代晚于《学》。

《广》的“时令门”中列举了这样一些年号“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明洪武年正是中琉关系建立之年,从明洪武年开始到清嘉庆年为止,中间恰好是这二十二年年号。这些年号被依次罗列出来(而不是列举性的)说明了什么?正说明《广》的编写时间就是在嘉庆年间。因为后面的年号对作者来说还是未知的。

《广》晚于《学》,而《广》的编写时间又在嘉庆年间。这与《学》的编写时间形成了互证:再次排除了《学》作于咸丰二年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缩小了《广》的编写时间段,即《广》的编写时间应该在嘉庆二年到嘉庆二十五年(1797—1820 年)之间。至于是这二十三年中的哪一年,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